

回眸中国出版业（五）

马敏 主编



目 录

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	1
盲文、文体、旅游、生活用书的出版	17
新中国出版事业的管理和建设	65
出版管理的规章制度	78
出版队伍的建设	98
出版科研工作的开展	118
出版群众团体的建立	127

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

在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少年儿童读物一直受到广泛的重视，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它的发展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

中国是编辑出版少年儿童读物较早的国家之一。散见于中国古籍中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干将莫邪》、《画中人》、《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都可视为古代的儿童文学篇章。而《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图书，可归属于少年儿童知识读物和文学读物。至于《千家诗》、《神童诗》、《小儿语》、《小学弦歌》等，则是当时人专为儿童写作的启蒙读物。以上这些，对中国近现代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进步思潮猛烈冲击着古老的中国。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杂志征求关于妇女、儿童的文章，陈独秀明确提出“儿童文学应是‘儿童教育问题’之一”，同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在小说结尾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五四”运动唤起了一代人的觉醒，许多报刊杂志开展了儿童教育新途径的探讨，提倡将孩子教育成为“组成社会的重要分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虽然有些发展，但在内容与数量上均有一定

限度。“五四”运动以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情况才有很大改观。并且呈现日益发展的趋势。

先说儿童文学读物。许多著名作家和一些致力于儿童读物写作的新作者，为小读者创作和翻译了不少优秀文学作品。同时，一些大的综合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等，先后出版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和其它知识读物。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先后出版了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先后分别出版了叶绍钧的著名童话集《稻草人》。此外，郑振铎的童话《长鼻子的矮子》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

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制订了《儿童共产主义运动决议案》，其中指出，“儿童读物必须过细编辑，务使其成为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儿童的读物”，用以“在儿童纯洁稚嫩的脑子里栽下共产主义的种子”。这些规定，对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冰心的《寄小读者》，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译著和创作。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里，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儿童文学与其它读物受到了有识之士的关怀。鲁迅、郑振铎、茅盾、罗荪等人都著文分析了“五四”前出版的一部分儿童读物，倡导应为孩子们写知识性作品。这一时期出版了郭沫若的儿童短篇小说《一只手》，茅盾的儿童小说《大鼻子的故事》，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陈伯吹的中篇童话《阿丽思小姐》等一些优秀作品。此时中华书局编印的“小小说”，多半是从《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小说以及先秦寓言中节选出来的。他们还根据《左传》、《战

国策》、《史记》、《世说新语》等，专门编写、出版了《儿童古今通》。

到了四十年代。除了再版冰心的《寄小读者》，出版了严文井的童话《四季的风》等一些优秀作品以外，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出版了一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这些出版物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一直流传至今。

其次，少年儿童系列丛书，开始实现有计划的成套的出版。

那时许多有影响的出版社，有计划有步骤地出版了一些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方面的少年儿童系列丛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幼童文库》、《儿童史地丛书》，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文库》、《儿童百科丛书》、《小小说》等。这些丛书的出版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探索。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出版的少儿科普读物，多以翻译外国作品为主，中国科普作家自己创作的作品不多，出版则更少。

再次，少年儿童杂志的出版是一个重要方面。总的看来，种类虽不很多，但不乏办得较好的杂志。它们以健康有益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形式，有力地吸引着小读者。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一年创刊的《少年杂志》，是较早的期刊之一。而一九二二年四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小朋友》，迄今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拥有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早期的读者现已进入古稀之年了，回忆起来仍觉兴味无穷。这一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杂志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周刊，北新书局的《小学生》半月刊，现代书局的《现代儿童》月刊，儿童书局的《儿

童杂志》月刊，以及开明书店的《新少年》、《中学生》等。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多年中，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当代中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在整个出版事业中，少年儿童读物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不但出版的书刊品种不多，印数很少，部分图书的内容格调也不高，有些甚至质量低劣，因而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一九五二年底，以上海的新儿童书店为基础，吸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同书局的儿童读物编辑出版部门，合并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它是新中国第一家大型综合性少年儿童读物专业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评选出优秀作品 46 种。这次评奖活动激发了广大作者为少年儿童创作的热情，对促进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起了良好作用。一九五五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呈送了《关于当前少年儿童读物奇缺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一九五四年全国有 7000 万有阅读能力的少年儿童，而为他们编辑出版的读物仅有 420 种，1387 万册，平均每 5 个小读者才有 1 本书。国务院迅速批转了这份报告，并指示组建中央级的少年儿童读物专业出版机构。同年九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号召作家和社会有关部门重视儿童读物的创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这一号召得到热烈响应，许多老作家又热情地为新一代少年儿

童写作，不少新作者也积极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正式建立。根据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一九五七年改名共青团）对少年儿童进行德、智、体、美教育的要求，该社建立不久，即及时出版各类书刊，以后稳步发展，逐年有所增加。设在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品种和数量更多一些。加上少数其他的出版社也出版少量少年儿童读物，因此这一时期内，可以说适当地满足了广大少年儿童课外阅读的需求。以一九五七年为例，全国出版少儿图书 2015 种，比一九五四年增加 4 倍多，印数 3800 万册，比一九五五年的 1387 万册增加了 1.7 倍多。在这些读物中，像冰心的《陶奇的暑期日记》、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洪汛涛的《神笔马良》、冯雪峰的《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葛翠琳的《野葡萄》、高士其的《我们的土壤妈妈》，以及任德耀的儿童剧《马兰花》等，都是小读者所喜爱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

这一时期全国性的少年儿童杂志，除原有的《小朋友》、《中学生》外，还创办了《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红领巾》、《我们爱科学》等。此外，许多地方的文艺刊物也开始经常地发表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可以说，从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发展较快，也很健康，开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可喜局面。

可是好景不长，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也挫伤和削弱了少儿读物的创作和编辑出版队伍。一九五八年

开展的“业务思想批判”中，有人将儿童特点与“童心”混同起来，把儿童特点批判为“儿童本位论”，指责少儿读物中“古人动物满天飞，可怜寂寞工农兵”。从而进一步否定了儿童特点与文学创作规律，要求少儿读物也要跟着中心任务跑，随着政治运动转。这次“批判”引起编创思想的极大混乱。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版的少儿读物，严重脱离少年儿童的教育实际和少年儿童的生活实际，以至“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茅盾语）。一个相当不短的时期内，一批没有儿童特点、缺乏文艺性和知识性、充满政治口号和成人语气的小册子不断印行，实在算不得是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

不过，即使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在教育界、出版界一些有识之士努力下也出版了一些好书。历史知识读物如林汉达编写的《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这是《中国历史故事》丛书的头3种，它用生动的规范化的普通话口语讲了一百多个历史故事，在培养少年儿童学习历史的兴趣和写作方面都有益处。林汉达原已计划好从春秋时代一直写到清朝，遗憾的是他于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这一套优秀读物便只出版了4册（《东汉故事》于一九八一年才得以出版）。自然知识读物有《少年自然科学丛书》和《少年科技活动丛书》，《十万个为什么》知识丛书，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科学家谈21世纪》，以及科学文艺读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的《“小伞兵”和“小刺猬”》，萧建亨的《布克的奇遇》，伍律的《蛇岛的秘密》，孙明玖的《野兽医院》，艺夫的《错误百出的故事》等。这些读物在诱导少年儿童爱科学、学科学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文学读

物如徐光耀的《小兵张嘎》，邱勋的《微山湖上》，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低幼读物中，张士杰的《渔童》，方慧珍、盛璐德的《小蝌蚪找妈妈》，赵燕翼写、杨永青画的《金瓜儿银豆儿》，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迎解放》等，在帮助孩子们认识社会、理解生活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有的作品如《小兵张嘎》还被改编拍成电影。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是十年动乱时期，少儿读物的出版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和摧残，许多作者被打成“黑帮”“黑线”人物，亿万少年儿童陷于精神饥饿，嗷嗷待哺。

“四人帮”粉碎以后，各种编辑出版工作逐步得到恢复。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上“左”的指导思想并未清除，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尚未落实，因此少儿读物的出版步子迈得很慢。据统计，一九七七年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仍然只有两家，复业的编辑人员 200 多人，年出版书刊 200 余种，2600 万册。这几个“2”的数字，面对的是全国 2 亿少年儿童读者，平均每 8 个孩子才有 1 本书！严重的书荒并未得到缓和。

一九七八年，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讨论了如何为少年儿童多出书、出好书等问题。会议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这次会议为少儿读物的出版工作带来了生机，这一年全国出版少儿读物 437 种，但仍然远远满足不了少年儿童课外阅读的需要。正如作家康濯在湖南省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即席赋诗所感慨期望的：

正是嗷嗷待哺时，庐山润泽布昭苏。

经传长岛流甘露，墨泼潇湘化雨丝。

旭日风华需织锦，孤儿佳话应吟诗。

童心胜迹千千万，彩笔勤挥莫稍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带来了春风雨露，紧接着的两年就增加到 3546 种。上述在庐山举行的会议上制订的 29 套重点丛书规划，也开始实施。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承担的《少年百科丛书》，截至一九八一年已出版《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故事》、《中国文学家的故事》、《外国文学家的故事》、《今日的科学》、《生命进行曲》、《金属的世界》、《数学万花筒》等 70 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承担的《小学生文库》，已出版《周总理的美德》、《时间伯伯》、《蜜蜂王国旅游记》、《饮马河边》、《孙中山的故事》等 17 种。其余的丛书也都由有关出版社承担，并陆续编创出版。经过两年的努力，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重新奠定了基础。

一九八一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在泰山举行。会议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进一步繁荣少儿读物的创作出版。自此，少儿读物的出版工作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在此以前，全国只有两家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这次会议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没有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省、自治区，也在各地人民出版社中设立了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室。到一九八九年年底，全国共有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 27 家，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少儿读物出版体系，大大加强了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阵地。

与此同时，少年儿童读物的作者队伍也在不断发展

壮大，从七十年代末期的 100 余人，发展到一九八九年的 3000 余人，其中 500 余人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少年儿童读物的编辑队伍也随之扩大。到一九八九年，全国已有少儿读物专业编辑 1000 余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机构的建立，编辑队伍与作者队伍的日趋壮大，为少儿读物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九八一年全国出版少儿读物 2520 种，其中新版书 2110 种，总印数 7.8674 亿册；一九八九年出版少年儿童读物 3598 种，新版书 2395 种，总印数 2.2602 亿册，与一九七七年少年儿童出版物 200 余种、印数 2600 余万册相比较，均有显著增长。少年儿童期刊从一九七九年的 30 种左右，发展到一九八九年的 83 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促进少年儿童出版物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全国性的评奖活动在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七年，分别举办了 3 次。许多深受小读者喜爱的思想教育读物、社会知识读物、自然知识读物、文学艺术读物以及低幼读物获奖。这些优秀读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叶圣陶的《稻草人和其他童话》、冰心的《小桔灯》、叶君健的译作《安徒生童话选》、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萧平的《海滨的孩子》、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鲁兵主编的《365 夜》、张麟、何家栋的《赵一曼》，以及岫石、张怡庄的《泥娃娃》等。这些评奖活动既反映了作家们的成就，又促进了少儿读物出版工作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各类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编写和编辑工作，既不同于成人读物，也不同于青年读物，而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在一些方面有比其它读物更大的难度。少儿读物

不仅要注意内容的选择，务使其正确健康，而且必须有巧妙的文字表达方式，富于启发性、想象力，为孩子们喜闻乐读。这就必须根据少年儿童每个年龄段的特点，包括生理、心理成长的状况，理解、接受能力的程度等等。要达到这一步很不容易，然而又必须努力做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少儿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者，辛勤耕耘，孜孜以求，进行过许多探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四十多年来出版了大量优秀的读物。

一、社会科学知识读物

这类读物在对少年儿童传授基础知识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引导他们从小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习优秀人物的崇高品德，陶冶情操，养成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编辑这类书切忌生硬地说教，而是采用小读者感到自然亲切的形式，如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记叙人物、讲述故事，寓教于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中，潜移默化地在孩子们心灵中播下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劳动、爱科学的种子。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四省合作出版的《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81种）、新蕾出版社的《现代革命斗争故事丛书》（7种），向小读者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业绩。严振国编写的《周总理的美德》、丁隆炎的《少年彭德怀》，以及新蕾出版社出版的《元帅的故事丛书》也都属于这一类。一九八九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英雄少年赖宁》一书，以配合全国范围内的学习、宣传赖宁的活动，为培养新一代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份丰厚的精神食粮。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林汉达、曹余章编著的

《上下五千年》、陈必祥等编著的《世界五千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17册）、《中国革命历史故事》（6册）、《外国历史故事》（5册）等书，都是以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为线索，生动地叙述了中国或世界历史。其中《上下五千年》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全国少儿读物评奖中，荣获“优秀社会知识读物”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陕西未来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协作出版的《可爱的祖国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等14家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祖国大家庭丛书》、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国宝》（共4册）等，以各种体裁介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祖国的锦绣山河和各兄弟民族的风土人情等，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除了丛书、套书之外，还出版了为数更多的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地理、品德教育、少年先锋队知识等方面的单本读物，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二、自然科学知识读物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早在五十年代建社初期，就着手有计划地编辑两套丛书：一套是基础知识方面的《少年自然科学丛书》（一九六二年开始出版，截至一九八七年已出50多种），一套是科技制作方面的《少年科技活动丛书》（一九五八年开始出版，截至一九八七年已出20多种）。六十年代初，《十万个为什么》知识丛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自一九六一年初版，八十年代修订重版，迄今已重印6次，累计印数达54万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自一九七八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以初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少年百科丛书》，全套200种，自然知识占很大比重，在传授知识、活跃思想、培

养能力方面，发挥了“良师益友”的作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文库》和黑龙江、吉林、辽宁几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协作出版的《小学生文库》，都是综合性知识读物，其中自然科学知识读物占有相当的数量。

此外，专门向小读者介绍最新科技知识方面的书籍有：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新技术丛书》，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协作出版的《少年现代新科学技术丛书》，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儿童实验故事大全》等。聂波、王育英的《白头叶猴追寻记——野生动植物考察记》，张岳隋编著的《放大镜下的奇观》、陆品山著《远洋趣闻》、孙玉春的《神秘的第六大陆——南极探险》、周立明的《会“说话”的动物》等书，都生动地描写了自然界的多姿多态和千变万化，开阔了小读者的眼界，培养了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

三、儿童文学读物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三十年间，中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主要是儿童文学作品。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叶圣陶、茅盾、郑振铎、谢冰心等，都是“五四”新儿童文学事业的拓荒者，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和翻译活动的实践开一代风气之先，并深深地影响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后继者如张天翼、叶君健、陈伯吹、严文井等人。新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就是在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新的沃土里茁壮生长起来的。由于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多年里，尤其是在五十年代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内，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曾一度呈现初步繁荣景象，出版了一批深受小读者欢迎的优秀作

品。如老作家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陈伯吹的《中国铁木儿》、冰心的《再寄小读者》、金近的《春姑娘和雪爷爷》等，曾经陶冶了一两代新人。在跨越了十年动乱的“断裂带”以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解除了人为的禁锢，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最近十年中，比较迅速地展现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不仅体裁多样，题材也更加拓展。中篇小说发展较快，象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千里从军行》、《荒漠奇踪》，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下同）的《少年爆炸队》，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王冠的秘密》、《在一个夏令营里》、《蓝色的象鼻湖》等，都受到了好评。

为少年儿童精选、缩写、注释、讲评古典文学作品，是少年儿童文学读物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神话》、《西游记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故事》、《水浒》、《聊斋故事》、《岳飞传》等，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神话故事》，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白话聊斋》，新蕾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五十篇》，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族古典诗歌选注》，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唐代诗苑揽胜》、《宋代诗苑揽胜》等书，对于少年儿童初步了解、鉴赏中国古典优秀文学作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里，在向“四化”进军的号召下，科学文艺曾一度出现过前所未有的繁荣，如郑文光的《鲨鱼侦察兵》、《神翼》、《古庙奇人》、《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雪山魔笛》，萧建亨的《梦》，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等，都写得场面广阔、形象生动逼真，幻想奇妙。可惜后来这一门类没有得到进一

步发展。

向中国少年儿童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华，是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贝洛童话集》、《爱丽丝漫游奇遇记》、《格列佛游记》、《尼尔斯奇遇记》、《格林童话选》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国际安徒生奖作家作品选》、《伊索寓言精选》、《安徒生童话精选》等，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苦儿流浪记》、《快乐王子》等，新蕾出版社出版了《世界童话名篇欣赏》，各地少年儿童出版社大都出版了外国儿童文学名著的译本和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外国儿童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的出版，为小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使孩子们广泛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以及小朋友的生活、民俗风情和奇闻趣事等。

此外，为保存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积累这方面的文化，许多出版社还出版了各种选集。《三十年儿童文学选集》（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汇集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成果，包括短篇小说、诗歌、童话、寓言、儿童戏剧及低幼儿童文学诸方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儿童文学作品选集都有好几家出版社出版，其中叶圣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叶君健、贺宜、陈伯吹、金近、胡奇等作品选集已形成系列，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希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是一套上自“五四”时期，下至一九八六年，七十年来儿童文学优秀作品的总汇，不仅是奉献给少年儿童的一份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具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八十年代以后，许多出版社开始重视儿童文学理论

和儿童文学史料的出版。如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儿童文学概论》（浦漫汀、陈道林等编著）、《安徒生简论》（浦漫汀著）、《儿童文学引文》（日本·上笙一郎著，郎樱、徐敦民译）。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晚清儿童文学钩沉》（胡从经著）、《郑振铎和儿童文学》（郑尔康、盛巽昌编）、《茅盾和儿童文学》（孔海珠编）、《陶行知和儿童文学》（李楚才编）等少儿文学史料书。

四、低幼读物

低幼读物又是少儿读物中的一个特殊门类，它的出版在五十年代起步稍晚，但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发展较快。它的对象，不止于初学认字的学龄前儿童和已入学的小学低年级学生；随着计划生育方针的实施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婴幼儿教育问题受到更大的重视，对这类出版物的需求也随之摆在少年儿童出版工作者的面前。一九八三年，国家出版局召开了全国低幼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交流了编写和出版这方面读物的经验，推动了这一工作的进展。一九八一年，全国出版低幼读物300余种，此次会后每年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到一九八八年年底，低幼读物出版700余种，一批优秀读物脱颖而出，成为多次印刷的保留书目。如《365夜》（鲁兵主编，少年儿童出版社），自一九八一年初版以来，已再版16次，累计印数达300余万部。《婴幼儿小百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以1—3岁儿童为对象的读物，图文并茂。《故事大王画库》（1—12辑，新蕾出版社）、《动物故事》、《实用幼儿故事大全》（上、下，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婴儿智慧园》（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等，都属于优秀的低幼婴儿读物。

一九八一年以来的低幼读物有两个引人注意的特